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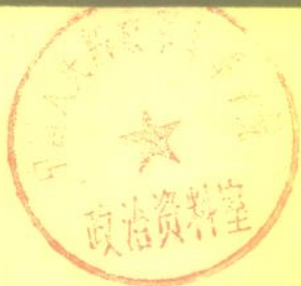
【西班牙】费南德·克劳丁著

共产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到
共产党情报局

第一卷：共产国际的危机

现代外国政治
学术著作选译



〔西班牙〕费南德·克劳丁著
方光明 秦永立等译



共产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到
共产党情报局

第一卷：共产国际的危机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年·福州

FERNANDO CLAUDI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FROM COMINTERN TO COMINFORM
PART ONE
THE CRISIS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内部发行)

共产主义运动
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
第一卷：共产国际的危机
〔西班牙〕费南德·克劳丁著
方光明 秦永立等 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12.25 印张 2 插页 292千字

1982年12月第1版

198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书号：2173·19 定价：1.30元

610782/15

说 明

这部译作基本上共同劳动的结晶。八一年初，项加贤、徐仲雄、陈海红、王之光、葛人杰、张少伯、赵小平、莫荷英、应娅舒诸同志译出了大部分初稿，八一年夏由方光明同志补译、修改、校订，旋因另有任务中辍。是年秋冬，商亚南同志应邀为本书总校，付出了很大的劳动。秦永立同志对全书作了文字上的疏通和必要的润饰。

翻译这部世界上流传很广的著作本来是力不从心的。由于多方协助，特别是李宗禹、校纪英、殷叙彝、刘知行、王务翰、张文英、林珍珍诸同志和福建人民出版社同志的具体指导和热情鼓励，本书终于同读者见面了。借本书出版之机，谨向上述同志和单位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再加时间仓促，书中讹误之处肯定不少，衷心希望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82年2月于杭州大学

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评价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人们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

——马克思

我们不应该对敌人隐瞒我们的错误。谁害怕这样做，谁就不是革命者。

——列宁

法 文 版 说 明

为了这本法文版的问世，我校对了西班牙原文，对主要是一些具体论点作了些改动，目的在于使某些观点阐述得更清楚些，使某些地方针对性更强些。此外，我还注明了新的参考书目。唯一实质性的改变是把这两卷的最后两章（西班牙原文的标题是“跋”和“第一版后记”）合并为单独一章——结论，以此结束全书。在这新版本中，我删去了一些我认为是次要的问题，同时对另一些问题则作了补充，对这些问题我在西班牙文版的最后几章中没有加以充分的注意。

费·克劳丁

英文版说明

在出版英译本第一卷时，由于布赖恩·皮尔斯认真细致的工作，使我得以改正原文中的一些错误，以及在法文版中出现的错误。谨借此机会，向他表示感谢。

费·克劳丁

序 言

1950年，伊萨克·多伊彻在其文集《异教徒和背教者》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看来，不参加唇枪舌战似乎是被开除出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所能采取的唯一有尊严的姿态。”这话乍看起来似乎难以捉摸。现让我们对此作进一步仔细的考察。

多伊彻在1950年写的那几页中，分析了某些曾经是党员或是党的同路人的作家（诸如阿瑟·凯斯特勒，伊格纳齐奥·西罗纳，安德列·纪德，路易斯·费希尔，理查德·赖特和斯蒂芬·斯彭德）所发表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见解，并且很快得出结论说，如果他们都对论争保持沉默，情况就会好些。显然多伊彻并不喜欢那些被开除出党的知识分子，或者至少不喜欢在1929年，即左翼反对派失败后被开除出党的那些人。他似乎是说，在所有促使他们成为脱党者的情况驱使下（即，客观的条件，开除过程对他们的强烈的谴责以及稍早一些被开除的那些人的挖苦讽刺），成为一个脱党分子实在是太容易了。

实际上，人们往往被开除得不是时候，不是太迟就是太早。太迟是指的理解关于斯大林主义，关于苏联以及俄国在世界上扩大势力范围而形成的一些社会等客观事实太迟。这些事实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没有看清，因为他们被笼罩在优先考虑行动以及由于“历史原因”这一花招之上的思想迷雾所迷惑。太早是指在党内被人理解和仿效还太早，可能性不大，因为在党内你是进行

一场处于少数地位的战斗，所以这场战斗是注定要失败的。这双重的迟缓——迟迟不能领会事态的客观密度，大多数共产主义战士落后于少数想要采取一种“新策略”的先进分子——并非出于可以一笑置之的偶然的状况。它具有一种严格性，一种适用于一切时期，适用于共产主义一切危机的历史规律的严格性。

因此，伊萨克·多伊彻对脱离共产党、或与党断绝关系的知识分子不甚相信。他劝告他们不要进一步卷入政治，要置身于斗争之外。简言之，不要再介入了。由于多伊彻是从使人疏远的信仰主义突然转到达官贵人的不可知论，他无疑会赞同罗杰·维兰特所采取的态度。

由于多伊彻对历史的类比颇感兴趣，尽管这种爱好在革命者中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理论灾难，他还是向被开除出党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过去象杰弗逊、歌德、雪莱等人所采取的态度作为榜样。为什么他提出这些令人震惊的名字呢？因为他认为，在斯大林时代和拿破仑时代之间作一个历史性的比较是可能的。由于这些人能够领会到“尽管拿破仑使用暴力和诡计，法国革命的使命还是能够在整个十九世纪产生巨大的影响”，他们从不参加有利于神圣同盟的自由党人的大合唱。因此，被开除出共产党的知识分子要仿效杰弗逊、歌德和雪莱。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奇怪的历史性比较。难道十月革命的使命会不受斯大林的暴力和诡计的影响而继续传播到各地吗？难道列宁主义的雅各宾派本质能超越苏维埃的“热月”被人们不断地认识清楚吗？难道因为党是“历史理智”的化身，那些被驱逐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就必然是叛徒吗？多伊彻并没有明确地系统地提出这些结论，但是他似乎是在暗示这些结论，他这么做时似乎是凭思想上的错觉又夹杂了一些具有高度时代特征的失望情绪。

但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了。费南德·克劳丁不是作家，他没有参加以保卫文化与和平的人民阵线纲领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运动，但仍然因小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罪行而被驱逐出党。

大概在1933年，费南德·克劳丁——马德里青年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人、建筑系学生，放弃了一切个人抱负，成为一个职业的革命家（革命没有按照职业革命家的意图发展，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2月他被开除出西班牙共产党为止，他的一生和共产主义运动生涯、西班牙革命历史及其成功、挫折和错误融合在一起。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岁月，内战、失败和移民，反对佛朗哥的地下活动——所有这些事件，他在共产党机关担任中央负责职务时都经历过了。

西班牙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争辩于1963年底开始一直继续到1964年春并以开除克劳丁和另外一些领导人而告结束（这是辩论吗？能把一再重复而毫无效果的两种独白的对峙，意见毫不一致的会谈称为“辩论”吗？这种会谈根据斯大林主义三十年的实践所形成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以下两者之间作出抉择：要就是少数人机械地服从，要就是宗派行为。但这两种选择由于种种原因都是无效的）。

1965年以来，在这场冲突中形成的根本问题已经成熟数年了。危机迟早要在西班牙共产党的上层核心中爆发。然而，确定危机过程的开始和结束日期（既是历史上的又是法律上的意义）不是不重要的。1956年，不仅是召开二十大和发表“归咎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一年，首先也是在从属于俄罗斯霸权主义的国家集团中，离心倾向突然爆发的一年。其中有些特征为民族主义的倾向，虽然不可避免，但基本上是消极的，因为它们标志着为过去几年付出的代价（这是克劳丁分析中所说明的历史问题之一）。在过去的几年中，总是粗暴地要把各国民族革命利益完全

服从于俄罗斯一国的利益。不过别的离心倾向具有社会的本性，而且是非常积极的。在这几年中，从波兰到匈牙利，到捷克斯洛伐克，尽管一个个都被苏联政府的军事干涉压服，但这些倾向已把需要新的社会主义民主这事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实际上，这是需要革命、需要武器的批判，而不是批判的武器。确实，这些倾向所采用的政治口号常常是含糊不清的，因为具有这些倾向的社会力量经历了几十年历史上的黑暗统治，官僚主义对群众一切积极性的破坏，以及集体的非政治化倾向和道德败坏，这些情况使人觉得好象除了个人野心、技术上的犬儒主义和宗教狂等等个人“自救”的办法之外，完全无路可走了！

另一方面，1956年对西班牙来说是决定性的一年。这是工人、学生进行伟大斗争的一年。在斗争的过程中阶级力量的新的相互关系开始形成，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关系摆脱了内战时期奇异的服装和思想上过分自信的影响。就在这一年中，从闭关自守时期继承下来的政治领导体制开始进入了危机。西班牙资本主义经济的目标本身在客观需要的压力下开始改变了。这种客观需要是：广泛积累阶段转变为劳动生产率的发展阶段，以及在世界市场上获得竞争能力的阶段。也就是说，西班牙资本主义经济的推动力不再是榨取绝对剩余价值了，而必须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是西班牙资本主义接近于“现代”阶段的明显标志。

然而，在1963——1964年间，西班牙共产党上层领导的危机逐步成熟到爆发点时，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有关西班牙斗争的战略问题没有一个得到解决。恰好相反，主观主义者和乐观主义者思想所勾勒的现实与现实本身之间的鸿沟不断扩大。从中央到地方，在一切方面，这个时期是一个倒退的时期。

在苏联，“非斯大林化”并没有超越中央官僚主义领导集团之间进行清算的范围，实质上是在各主要方面保持原状的体制内

权力的再分配。

在西班牙，1962年工人斗争的规模本身清楚地表明了“全国和平罢工”的战略所遭受的决定性失败。这些斗争指出，以全新的办法处理西班牙的革命问题，即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当前目标和长期目标以及革命的阶级同盟者问题是非常必要的。

费南德·克劳丁自从1965年被开除出党以来，没有听从伊萨克·多伊彻的劝告，他没有将自己置于“斗争之外”，没有使自己“不要再介入了”。他并不想效仿杰弗逊、雪莱和歌德那些古老久远的榜样，而是效仿较近的榜样，多伊彻自己。尽管他们之间在工作作风、工作方法、在取得的政治结论方面差别很大，费南德·克劳丁还是象多伊彻一样给自己定下了所要达到的目标，即全面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和衰退的原因。因此，他当然把自己作试验并进行自我反省。这难道不是了解自己和领会自己一生经历的意义，即掌握和领会自己身受过并协助形成的历史经验的最好办法吗？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克劳丁重新发现了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令人鼓舞的特征。在对共产国际作历史性分析时，他没有把自己置身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中去以便在其中为自己的怀疑、怨恨或理论上的直觉知识找出证据。他研究这个现实为的是把现实的客观意义和辩证的发展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正是这种历史现实的展现，使克劳丁这本书具有独创的结构形式，因为它突破了按照年月次序编写的范围狭小的结构，以便建立一个辩证的次序，这个次序包括补充和对立的两个方面，即：逻辑上必不可少的重新排列和历史本身的（历时的共时的）排列。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显著特征吗？

乔治·森普伦

引 言

我和许多共产党员一样，一直对我们运动形势和前途，抱有轻松而又乐观的看法，打从1956年开始，我就不再有这种看法了。到那时为止，人们对运动的过去、现在甚至将来都没有什么疑问。不是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几位人类的超级天才已经替我们解决了所有的未知的问题。革命的道路当然比我们年轻时想象的要长一些，难一些；而且这条道路在落后国家里则画成一个大转弯，这点马克思却没有预见到，但现在这条路在我们面前仍是既清楚又明确。已经在占地球六分之一土地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正开始在许多其他国家同样成功地被建立起来，而经历着临死时痛苦的资本主义正在“总危机”的“第二阶段”中作着垂死的挣扎。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宣告了帝国主义“殖民地后院”的崩溃。在世界的其它地区，我们共产党人，“特殊模式”的人，是唯一自觉的和有组织的力量。由于我们掌握了经过上千次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有打垮了希特勒军队的坚不可摧的力量支持，毫无疑问，前途是属于我们的。革命过去遭到的失败是由于“客观条件”和“社会民主党人的背叛”，但是，我们的政策基本上一直是正确的。尽管共产国际退出舞台，我们仍然指望象列宁和斯大林的党那样英明而有经验的领导的援助，这种援助弥补了其他共产党，即其追随者们的缺陷。总而言之，世界革命的最后胜利是有保证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坚持的问题和努力的问题。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发表，以及匈牙利、波兰工人和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主义制度的反抗，一举打破了这一对事物的总看法。结果，出现了各种令人心烦的问题。其中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我们这种有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帮助我们解释现实，反而使我们看不到现实，并掩盖了现实。这究竟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就我个人经历来说，只是在对二十五年的斯大林主义教育进行了长期而又痛苦的清算之后，在西班牙共产党领导（我从1947年起就是其成员）内发生了一系列冲突之后，我才找到了这一根本问题的答案。我于1965年被该党开除，同时被开除的还有党的最年轻的领导成员费雷特里戈·桑切兹，他的情况与我相似。俗话说得好，“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这种无法回避的事实反而给了我必要的时间和思想自由，使我在自己知识和经验所允许的范围内得出我上面所提的问题的答案。这就是本书的由来。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得出了最初我不明白的结论：共产主义运动——斯大林主义的党，不论在国内或是国际范围上，不论是作为夺取政权的工具还是在行使权力方面，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陷入了全面的、不可挽回的危机。该党的性质使它无法进行自我改造，亦即黑格尔著作中所说的“自我否定”。当然，这并不排除这一运动中多少比较实际的部份会有助于缔造新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可能性。我们时代需要这样一支先锋队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必须把许许多多共产党员的革命的主观主义和使党僵化的思想体系与组织系统区别开来。

我之所以提到一种新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先锋队，因为据我看来（在写作此书时，那些曾一度在这方面使我烦恼的疑虑已经冰释了）：不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上遭到了失败，而是某种教条

主义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遭到了失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革命的本质，它那许多主要的思想和论点仍然是恰当的，是有生命力的，——自然，我们必须考虑到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期，并适当地考虑我们自己所处的历史时期来继承他的事业。这就促使我们先得承认这样的事实，即歪曲马克思主义和使之教条化的前提在于它是革命运动的思想这一作用本身。斯大林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歪曲，而且可以说，也不是最后一个歪曲。这并不是偶然的。我对共产主义运动危机的探索就是试图运用这样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对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作一个批判性的分析。

这里，要谈的问题是如此广泛，又如此复杂，要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得借助社会科学各部门的许多著作。这样的著述已经发表好多了，然而这本书的主要部份尚有待撰写。本书并不比别的类似的著作更高明些。它并不是一部运动史，它只是对造成运动危机的主要因素和进程所作的分析。这无疑会给我的分析带上一层“消极”的色彩。但是，如果这种“消极性”能略为有助于开辟革命运动的新形式并使它尽可能地过去的神话和错误中解放出来，那末，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这种“消极性”将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的。

是否需要指出，此书不仅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批评，而且还是作者的自我批评呢？当然，这最后的问题是毫不重要的。

1969年12月

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

目 录

法文版说明

英文版说明

乔治·森普伦的序言

引言

第一卷：共产国际的危机

第一章 解散

漫长危机的终曲……………(1)

历史的讽刺……………(6)

承认破产……………(17)

本章附录……………(25)

〔注释〕……………(32)

第二章 理论危机

列宁的理论纲要……………(37)

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吗? ……(47)

列宁后期的疑问……………(53)

斯大林与修正主义者如出一辙:

 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61)

理论瘫痪的原因……………(81)